

中 东 欧 与 世 界

——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

〔美〕凱尔迪什主编

(供内部参考)

中 东 欧 与 世 界

——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

(美)凯尔迪什主编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ited by Stephen D. Kertesz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WORLD:

Developments in the Post-Stalin Er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本书根据美国圣母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本译出

中 东 欧 与 世 界

——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

[美]凯尔迪什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74·342 定价: 2.15 元

出版說明

这本论文集主要研究 1956 年以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变化,是 1956 年出版的《中东欧的命运:美国对外政策的希望和失败》一书的续篇。本书共收集了十五篇论文,涉及的范围除真正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中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外,还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以及奥地利。此外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本书十五篇论文分别由十四个作者写成。这些作者几乎全是中东欧各国的民族败类、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现在他们受帝国主义的雇佣,在美国各大学或学院任教,专门研究中东欧问题,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本书主编凯尔迪什系匈牙利人,现任美国圣母大学政治系教授,曾长期在霍尔蒂匈牙利外交部任职。从 1950 年起在圣母大学政治系任教,著有《国家的国际责任》、《急流中的外交》、《中东欧的命运》。

本书作者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后,特别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以后,一个集中指导的“共产主义帝国”已经不再存在,从而使集团内部的关系大大地复杂化了。作者对中东欧国家在 1956 年开始的“自由化运动”感到欣慰,力主美国政府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文化渗透,促使这些国家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化。作者抱怨美国政府在匈牙利反革命

事件中表现“软弱”，哀叹匈牙利没有回到“自由世界”的怀抱。尽管如此，仍对美国政府寄以很大的希望，期待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便“解放”这些“被奴役的国家”。

本书作者注意到 1956 年以来中国在中东欧影响的增长。作者认为，中国对中东欧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苏联。现在苏联虽然恢复了它在这些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中的优越地位，但是中国已经明确地表明它能够在欧洲事务中起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目前，中国也正在通过迫使苏联采取比较强硬的路线来影响欧洲的政治，而且这种影响看来还将继续加强。作者对目前的中苏分歧抱谨慎态度，认为这个争论不致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指出侈谈美苏联合反华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序 言

圣母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在 1956 年出版的《中东欧的命运：美国对外政策的希望和失败》一书，考察了美国二十世纪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使得征服这些国家成为可能的国际政治条件——以及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它们的方法。

本书则论述在斯大林以后时代，特别在 1956 年以后发生的中东欧事件。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苏联对这个地区国家的持续统治和苏联势力范围外面一些国家的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已经丧失掉独立国家的资格，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在受苏联保护的政府统治下具有形式上的独立。南斯拉夫人民在经历着铁托牌的共产主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权，首先得到南斯拉夫的支援，随后又被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1960 年以后又由共产党中国给予赞助。决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是用投票取得政权或者敢于在自由选举中测验民意的。内政上的警察方法和外交上的新型帝国主义标志着共产党的政策。

卫星国命运的意义超出了它们本身特殊经验的范围，而在国际关系上具有重要地位。对非共产党国家来说，它们的命运当然是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赫鲁晓夫总理谴责了斯大林某些残暴和罪恶的行为，但是并没有放弃斯大林的国际政治原则；他只是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来实施这些原则而已。虽则苏联自

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与自由的战士，可是有长期独立生存记录的中东欧国家却被铁拳统治着，并且被迫同欧洲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苏联代表的外交活动是以自相矛盾的言论为其特点的。尽管苏联把共产主义制度强加在中东欧一亿人民身上，但他们仍然到处鼓吹民族解放。

最近几年来，共产党集团内发生了一种趋向独特多样化的本质转变。集团的集中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中国同苏联争夺对共产党集团内部和外部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控制方面已经改变了。中国已经成为中东欧的一项政治因素。苏联在集团内部的政策本身也有了改变。这些新因素值得仔细评价，而这就是出版本书的目的。

我要向印第安纳大学弗雷尔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他是我的编辑顾问。他阅读过所有章节，有几章读了好几遍，并且在编辑过程中给予最有价值的帮助。我的研究助手克鲁吉和几尔迪参与了编辑工作，我衷心感谢他们的合作。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乐意阅读一些章节，并且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我衷心感谢他们无可估量的帮助。索引的编制是由奥尔迦开始，波地完成的。

司蒂芬·D·凯尔迪什

目 录

序 言

一、另一个五年.....

美国圣母大学 司蒂芬·D·凯尔迪什 (1)

第一部分：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

二、波罗的海诸国.....

美国国会图书馆 卡利斯·卡尔宁斯 (20)

三、波兰.....

美国福特汉大学 奥斯卡·海尔茨基 (47)

四、东德.....

柏林东欧研究所 卡尔·C·邵尔海姆 (67)

五、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纽约市立学院 伊伏·杜恰采克 (98)

六、匈牙利.....

美国圣母大学 司蒂芬·D·凯尔迪什 (126)

七、罗马尼亚.....

美国魏恩州立大学 司蒂芬·费歇尔-加拉蒂 (165)

八、保加利亚.....

美国佛蒙特大学 L·A·D·德林 (179)

九、阿尔巴尼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斯太符罗·斯坎第 (212)

十、1954~1961 年中东欧的经济发展.....

美国华盛顿城 社·华谢拉基 (246)

十一、中国：在欧洲的一个新势力.....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約瑟夫·L·薩頓 (281)

第二部分：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周圍

十二、赫鲁晓夫时代鉄托的南斯拉夫.....

美国司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密洛拉德·德拉科維奇 (298)

十三、芬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約翰·胡奥列能 (334)

十四、1955~1961 年的奥地利.....

美国得克薩斯大学 R·約翰·拉斯 (358)

第三部分：西方与中东欧

十五、斯大林死后美国和西欧对中东欧的政策.....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罗伯特·F·貝尔納斯 (376)

一、另一个五年

司蒂芬·D·凯尔迪什(Stephen D. Kertesz)

自从《中东欧的命运：美国对外政策的希望和失败》这本论文集出版以来，中东欧最有揭发性的事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尽管在上述著作出版的那一天，即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同匈牙利政府和其它华沙条约参加国就“苏军进驻匈牙利领土问题”开始进行磋商，但苏联仍然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选择军事措施来解决匈牙利问题的。

俄国军队镇压起义带来了一个最后审判的时刻。它甚至对共产党人自己也证明，共产主义不能达到永久抓住人心的目的，而是要依靠苏联武装来支持的。它对不结盟国家是一次警告。最重要的是它向被奴役国家揭示了它们处境的严重性：西方在一个危急时刻没有能够向俄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挑战，并且对一个企图解放自己的国家只能提供道义上的援助。

虽则匈牙利的短命独立被摧毁了，然而匈牙利为自由而战的教训和全世界的反响表明是决不可忽视的。苏联军队在布达佩斯街头屠杀工人和学生拆穿了苏联的大谎言，这正象后来中国侵略西藏向亚洲证明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的实际意义一样。在匈牙利作战的俄国士兵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必须杀死工人和学生——而正是这些人们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热情拥护者。数百名西方记者在布达佩斯目击那些革命的日子，并且把这些事件加以报道甚至用电视传送给全世界。苏联

领导人否认这种事实。可是即使在苏联，有些公民也为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感到羞耻。虽则共产党人仍在重复着苏联官方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说法，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是不相信。

匈牙利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共产党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的教导失败了。人们曾经担忧过按照共产党的箴言教育起来的新的一代要不再受自由世界的影响了。但匈牙利革命给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上风这个概念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个概念甚至某些反共的西方思想家也是承认的。匈牙利作家、学生和工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挑战；匈牙利革命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自愿地被接受或保有的，它只有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才能生存。当莫斯科摊牌的时候，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对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的幻想愈益破灭了。

匈牙利革命，同时发生的波兰十月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共产党集团的政治震动，确实是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的证明。尽管西方处于守势，共产主义的弱点在中东欧仍然暴露出来。近几年来，公开讨论分歧的情况勉强地被容忍着。集团内部的协调成为一项更加复杂的任务了。

俄国的卫星帝国

甚至一些机敏的西方政治家也相信紧接着斯大林死后在苏联集团内会发生革命和骚动。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尽管在斯大林死后产生了困难，苏联政府仍然保持住它在中东欧的主要权力。但是苏联集团内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斯大林晚年强硬政策之后，接着就是他的继承者争权夺利。令人吃惊的同铁托的和解与1955年贝尔格莱德声明，这项声明强调每个国家有权选择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

他以前主子的指责，都加强了大部分卫星国家的反斯大林主义力量和自由化倾向。这类事件以1956年波兰骚动和匈牙利起义为其顶点。赫鲁晓夫不仅经过这些事件存在下来，而且表明他有能力利用挫折来得到好处。西方在苏联军事干涉匈牙利面前采取消极态度，加重了卫星国家的困难处境：除了苏联控制外别无他途。

在波兰，勉强作出初步决定以满足哥穆尔卡坚持内政的自主权之后，克里姆林宫就控制着事态的发展。波兰事件表明，在共产党集团内部最多也只能得到一种有限度的民族自由。西方在法律上勉强承认奥德-尼斯河线，和波兰普遍担忧德国复兴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助于限制1956年10月事件的进程。不久之前波兰人开始了对将来怀有希望。哥穆尔卡周围斗争性强的共产党人着手重建权力大厦，加强党的机关和政府的形式制度。关于“十月目标”已经取得和解。1957年《直言》事件引起的暴动期间反苏的波兰民族主义再度被制止。哥穆尔卡在他的党内重建相当程度的纪律方面得到成功。他赢得了克里姆林宫的信任，并且证明，有适度自由的波兰仍然能够是一个可靠的卫星国。他忠顺地赞同1958年对纳吉执行死刑。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问波兰期间承认了他所看到的哥穆尔卡所有的“渐进主义”政策，以及一切为这些政策提供了余地的共产党集团的理论公式。哥穆尔卡作为赫鲁晓夫的忠实拥护者参加了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以及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而且向苏联表示了比以往更牢固的友谊。

虽然十月事件的许多成果逐渐地被废弃了，波兰人还是得到一些好处的。自由讨论保留下来了，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继续进行着。波兰表明一个共产党集团国家可能增进同美国的关系并且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如果说哥穆尔卡攻击美国已经确

实影响到美国对外政策——在 1961 年 12 月美国出售给波兰的农产品仅值四千四百六十万美元，比前几年少得多——但波兰自 1956 年以来仍旧接受了许多美国援助。

通过华沙条约，俄国继续指挥和控制着卫星国的军队编制。卫星国大约有六十个师。卫星国向共产党集团提供的军事力量在数字上虽则可观，但卫星国军队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怀疑的。1956 年苏联表明它乐意于镇压一个难驾驭的卫星国，以维持对一个地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地位。一般说来，火箭和空间技术方面的成就以及苏联似乎有能力把这种工业技术的确实证据转变为政治权力，加强了克里姆林宫在集团内外的威信。

苏联在集团内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同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地位并行不悖，而后者曾在多次危机中表现出来。在每个共产党国家，形式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罅隙仍然同以前一样大。国家机器是为党的政策服务的。共产党领导向来得到苏联的支持。共产党集团大多数外交代表是党的官员，外交和党的联络系统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只根据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能分析集团的发展的。共产党中间的组织系统，特别是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个别联系，更为重要。

然而克里姆林宫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显然有了改变。赫鲁晓夫不仅向中国作了让步，而且比斯大林更加考虑到所有卫星国的特殊利益和发展。人事关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莫斯科领导人和卫星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确实经历了根本变化。某些卫星国领导人在集团内部关系上的影响大大增加。赫鲁晓夫推行一种动态的巡回外交，许多卫星国领导人也耽迷于这种外交。“荷兰航海家”业已被“飞行人民委员”代替了。

中国因素

在俄国欧洲发生变化的同时，整个共产党集团的结构也改变了。今天苏联所指挥的是一个成份不纯的帝国，并且还要勉强地容忍一个相当傲慢的年轻伙伴的活动，这个伙伴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解释，影响着集团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而且往往是同莫斯科的观点和利益不相一致。一度集中的共产党系统正经历着两极分化，这一点正为下述情况所证明，即很多其他的共产党现在既经常赞扬苏联领导也赞扬中国领导。在过去，把共产党领导同苏联共产党领导看做同一个东西曾经是自明之理，而且几乎成为共产党思想中很自然的一个部分。中国在共产党集团和世界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是一项新的发展；北京侵入莫斯科的中东欧区域之快是意料不到的。也许两个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从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应用以及对共产党集团的领导权等方面来看可能是真实的。谁将统治亚洲？何处是划分苏联和中国势力范围的界限？谁控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解释者？这些问题构成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间对立的核心。

中国人具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不信任俄国人就象他们对别的人全都不信任一样。还有俄国人在由来已久的一个时期中养成对外国人的怀疑。因此在苏中关系上插进了许多不信任因素。近几年来中国人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的民族利益，而且象俄国人那样把这些利益和国际运动的利益同等看待。他们向苏联的领导权挑战，理由是莫斯科牺牲中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利益来谋求增进俄国的“狭隘”利益。这种分歧——用忠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话来表述——常常要比几乎是永久性的领土冲突更加

构成对于共产党集团统一的一种严重威胁。

基于各种理由,包括经济困难和人口困难,中国人对世界形势采取更加生硬的看法并且鼓吹更加激烈的政策。当苏联的技术能力被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所证明时,中国的要求变得尖锐起来了。中国不赞成苏联支持非洲、中东和南美的非共产党政府,并且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东西方和解的政策。中国人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的一些宣传口号,如“和平共处”或者“立刻全面裁军”。

此外,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人不欢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在1960年7月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1960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人公开抨击苏联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立场。苏联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取得了优势,不过是以对中国人让步为代价的。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接受的纲领,对中国革命讲了一些应酬话,而认为欧洲卫星国值得更多的注意。它没有提到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虽则在1960年7月之前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反复地得到认可的。

赫鲁晓夫给予中国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且作了许多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让步,但是他不愿意给中国以原子武器或者接受中国关于世界政治的一些好战建议。中国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在中国1958年攻击近海岛屿时苏联没有给予支持。赫鲁晓夫那时知道,俄国的实力援助可能导致同美国作战,并且他知道这种可能的结果:如果美苏在一场核战争中互相毁灭,中国就能够成为欧亚的统治力量。中国的霸主地位,包括把中国牌共产主义强加于人,并不是俄国人所企求的前景。

中国在共产党集团内部权力地位的增长,以及中苏之间的

对立，严重地影响中东欧发生的事件。中国干涉中东欧政治是从1956年开始的一个全新的现象。首先中国领导人由于没有忘记他们和莫斯科打交道的历史，没有忘记斯大林制止过他们的野心，因此可能对卫星国的某些怨言表示真正的同情，并且欢迎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也可能在上述这点上进行投机，即俄国在这个地区统治权的任何削弱会抬高他们自己在集团内部的地位。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波兰和匈牙利并试图使这些国家平静下来。他可能提供了（至少暗暗地）北京对华沙和布达佩斯那些人的支持，而那些人则反对回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高压政策。当波兰骚动和匈牙利起义的充分意义不能再被抹煞掉，而且共产主义缺乏普遍支持显得极其清楚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就倒过来变成了“民族共产主义”的复仇女神。今天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最激烈的反对者。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最有意思的场面之一是赫鲁晓夫猛烈攻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谴责他们奉行斯大林主义和采取敌视苏联的行动。阿尔巴尼亚人得到北京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的庇护。他断言赫鲁晓夫没有权利公开批评任何共产党集团的成员。阿尔巴尼亚领导极不愿意改变它残酷的对内政策——“非斯大林化”几乎没有扩展到地拉那——或者放弃他们敌视外部世界的观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没有削弱阿尔巴尼亚保持民族统一的决心。当1948年苏南破裂终止了阿尔巴尼亚数年来对贝尔格莱德的隶属关系，并且当地拉那转向莫斯科作为它的最后和最好的“独立”希望所在时，这样的政策曾经对莫斯科的利益起过作用。赫鲁晓夫后来对铁托反莫斯科在理论上表现得“温和”以及采取不严肃态度，也许确实部分地说明了地拉那明显偏爱中国人的理由。表示这种偏爱的时机是在1960年春天成熟的，那时北京把它同苏联领导的争论公诸于世。阿

阿尔巴尼亚人第一次感到他们竭力反对苏联政策得到了支持，而且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11月在莫斯科他们都是同中国休戚与共的。

莫斯科以经济压力来作回答，并且在公开演讲里作了暗示，与此同时东德首脑乌布利希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也攻击了阿尔巴尼亚领导。苏联从阿尔巴尼亚萨森诺岛的基地撤走了潜水艇舰队。俄国和大多数卫星国专家离开了阿尔巴尼亚，而由中国技术人员来代替。1961年4月宣布了一项新的中国长期援助协定，给予阿尔巴尼亚1961年到1965年的五年计划以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国并且向阿尔巴尼亚供应购自加拿大和西欧的小麦。

继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口头攻击之后，霍查在196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同样回敬了攻击。他要求苏联集团对西方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更加好战的态度。紧接着俄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间公开争论的则是1961年12月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外交关系的断绝。一些卫星国仿效苏联从地拉那召回了它们的大使。可以肯定，阿尔巴尼亚不过是莫斯科同北京理论和政治权力斗争中的一个抵押品。虽然中国谋求在集团内部关系上经常发挥积极作用，并企图影响集团对非共产党世界的政策，但它想要从莫斯科手中夺取集团的领导权，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中苏联盟是一种利害关系的结合。中国是一个经济上不发达的大国，它为了自己的内部发展指望着莫斯科和有工业技术的苏联东欧卫星国家。而超越共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范围之外，则肯定中苏联盟是徒具形式和有限度的，并且要求在这两个主要伙伴之间取得和解。卫星国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同意某些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却不能遵循这些政策。虽然阿尔巴尼